

· 研究综述 ·

## 二〇一五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翟亚柳 乔 君 陈 鹤

2015 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又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世界研究中国的持续热潮中，一批与中共党史研究相关的新成果继续推出。本文在搜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按照党史分期，加以介绍和评析。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本年度国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总体上呈现抗日战争研究独占鳌头，其他选题数量不多但探讨相对深入的局面。

大革命时期。“从古代到 21 世纪的中国史”是近年俄罗斯中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其第七卷《中华民国史》于 2014 年出版。对于该书缺少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历史作用的介绍和对一些历史问题不准确的阐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 А. И. 卡尔图诺娃在《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革命史阐释的若干意见》<sup>①</sup>一文中强调指出：北伐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组织团体的支持与支援，中共在领导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国史》把北伐说成是简单的军事行动，忽视中共的作用显然是不恰当的。对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方式，卡尔图诺娃认为这是共产国际代表、中共和国民党三方代表经过长时间的、一次次的争论后，由共产国际提出的折衷结果。虽然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只是对一些已有学术观点的重申，但从俄罗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史的角度看是值

得关注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美国杜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江旷所著《毛泽东的文化部队：中国农村革命中的戏剧团》<sup>②</sup>一书考察了中共领导的文艺宣传工作发展史。本书第一章“革命将被戏剧化：红色戏剧团”分别介绍了以戏剧表演形式开展的红军文艺宣传工作在江西苏区和在红军长征中的发展与作用。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等坚持让思想教育贯穿于红军戏剧团的表演活动当中，认可戏剧团作为思想教育宣传的特殊和有效形式。红军军事学校俱乐部培养文艺人才，苏维埃开展戏剧教育工作，苏区先后成立了各种剧社、剧团，都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红军的文化部队也受到重大打击，人员牺牲或失散，但是红军文艺工作仍然在坚持着。甚至在北上的艰苦征程中，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每支部队都发展了各自独立的戏剧团，如“战士剧社”“战斗剧社”和“前进剧团”。不过作者也客观地指出，虽然中共领导者受到中国传统与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十分坚信戏剧对观众的影响力，并在这一点上具有共识，但因为红军始终面临残酷的军事斗争和生存条件，因此实践中部队文艺工作者易被轻视，红军早

①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по вопросу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стор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 Китае 20 - х годов XX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5. №1.

② Brian James DeMare, *Mao's Cultural Army: Drama Troupes in China's R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期文化剧团的人数、规模和实际表演受到限制，影响力也终归有限。但作者认为，中共的领导人始终在思想上看重戏剧宣传形式，重视对其戏剧部队的建设，甚至在江西根据地革命受挫和红军长征时也继续这么做。这一特色演变成中共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石川禎浩《重读〈红星照耀中国〉》<sup>①</sup>一文，在利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不仅对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英文、中文、日文和俄文版本进行了细致考察，而且通过介绍相关国家出版这部图书的情况，反映其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此外，该文还考察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未提及，但与斯诺采访活动有重要关联的一些历史人物，如马海德、刘鼎、冯雪峰、宋庆龄、董健吾等人对斯诺写作该书的作用和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在学术形式上表现为“三多”的特点，即国际学术会议多、合作研究项目多、研究成果多。

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多个国家举行。如2015年5月5日至6日，以“苏中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为主题的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术论坛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深入探讨了中苏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中苏在二战中的相互支持以及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与维护战后秩序等重要议题。9月2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5个国家的10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会议主题，与会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探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和意义、过程和影响，亚洲各被侵略国家的反抗与相互间的支持，战后反思等问题。11月21日，日本华人教授会在日本千叶主办题为“从战争、对立到和平——来自历史研究第一线

的声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sup>②</sup>。

跨国合作研究成果突出。2015年4月，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两卷本的《1937—1947 战争—世界》(1937—1947 La guerre-monde)一书，该书由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教授和抵抗运动史专家阿丽亚·阿格兰教授共同主编，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等国50余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撰写相关内容。书中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时间延伸到1931年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这在西方史学界比较罕见。这部二战全球史涉及亚洲战场的内容有五章。其中有较大篇幅陈述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以及在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发生的战事等。<sup>③</sup>2015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名誉教授马场毅主编的论文集《从多角度看日中战争》<sup>④</sup>，分“九一八事变前后”“卢沟桥事件以后”两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矛盾等方面选编了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学者的13篇研究论文。2015年9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牵头组织、郭岱君主持，美、中、日、英等国的学者参与的“重探抗战史”跨国研究项目，经过三年努力，推出了该计划的第一部成果《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sup>⑤</sup>。

抗日战争研究选题多样，成果丰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传统的政治、军事方面研究的选题进一步细化，一些以往被研究者忽略的选题，如南京保卫战、缅甸战役开始出现在国外学者的笔下，史料的运用也更加多样化。研究成

① 石川禎浩《『中国の赤い星』再読》，《现代中国文化の深层构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5年。本文主要内容已由乔君翻译，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6期。

② 高莹莹《“从战争、对立到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③ 端木美《1937—1947：战争—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3日。

④ 馬場毅編著《多角的視点から見た日中戦争》，集広舎，2015年。

⑤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一）：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军事战斗战役研究方面。曾推出《上海1937：扬子江畔的斯大林格勒》一书的法新社记者何铭生2015年再出新书《1937年南京保卫战》<sup>①</sup>，详细描述淞沪会战后日军从上海攻占南京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斗争和相关事件。该书运用多国史料，既追踪了交战双方的行动和战斗，也揭示了幕后政策和外交细节。作者认为，像淞沪会战一样，南京保卫战超越了中日双方的对抗，多国士兵、公民见证或参与到这场对抗之中。该书最后一章描写了南京大屠杀并对这一残暴事件进行了分析。本书在选题上丰富了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军事斗争的研究，但其写作手法更类似于新闻报道和纪实性著作，并且作者对于日本来源资料的利用要远远多过对中国来源资料的利用。需要指出的是，在抗战军事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仍然多以太平洋战争研究为着眼点，部分内容会涉及中国战场。如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军事史专业的丹尼尔·杰克逊的《饥荒、剑与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西南的解放》<sup>②</sup>，反映了中美军队1942年5月至1944年5月在中缅印战区并肩作战的历史；美国学者弗朗西斯·派克所著《裕仁的战争：太平洋战争1941—1945》<sup>③</sup>一书注意了经常被忽视的缅甸战役和中国抗日战争等话题；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的《海军的日中战争：通向亚州太平洋战争的一场自我毁灭》<sup>④</sup>一书，也专章介绍了淞沪抗战；等等。虽然这类研究数量不少，但对中国抗日战争史料的运用和对中国战场的直接研究仍比较有限，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外对中国抗战历史的全面反映。

地方政治和社会研究方面。日本学者马场毅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山东抗日根据地》<sup>⑤</sup>一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考察了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共同对抗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总进攻的“治安强化运动”。文章以过去一直未被重视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山东省公署”的活动为主、日军的军事活动为辅进行论述。美国芝加

哥大学的艾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草根阶层：山东邹平县》<sup>⑥</sup>一文，以邹平地方势力博弈和发展变化为例，说明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国共冲突已然在敌后地区形成。作者指出，邹平地方势力的分裂和冲突，就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上“军阀时期”的缩影。

抗战时期文化宣传方面。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历史学教授柯博文在《中国战地记者：抗日战争的遗产》<sup>⑦</sup>一书中，从中国抗战时期的战时报道及战地记者个人生活经历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历史遗产的影响。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抗战时期宣传的场景，以及战时报道所描述的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和严酷战斗的场面。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范长江、金仲华、邹韬奋等一批有影响的记者，相信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是以笔代枪，通过新闻报道激发民众爱国热情。追随这些战地记者的个人经历，柯博文继续考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记者与他们战时报道的命运沉浮。不过有评论者指出，与中国战地记者这一书名相比，书中提及的记者、媒体人等主要属于左翼阵营，如果要全面反映中国战时新闻史，例证显然还不够。

苏联与中国抗战方面。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是俄罗斯学者研究的重点。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士B. H. 戈尔巴乔夫的《抗战时期对

- ① Peter Harnse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Casemate, 2015.
- ② Daniel Jackson, *Famine, Sword, and Fire: The Liber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in World War II*,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2015.
- ③ Francis Pike, *Hirohito's War: The Pacific War, 1941 - 1945*, Bloomsbury, 2015.
- ④ 笠原十九司《海軍の日中戦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への自滅のシナリオ》，平凡社，2015。
- ⑤ 馬場毅《治安強化運動と山東抗日根据地》，见馬場毅編著《多角的視点から見た日中戦争》，集広舎，2015年。
- ⑥ 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国史馆”（台北），2015年。
- ⑦ Parks M. Coble, *China's War Reporters: The Legacy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中国的外部援助（1937—1945）》<sup>①</sup>一文，利用大量数据和实例反映苏联和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和一些历史细节，说明战争期间中国同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军事策略上相互配合，在军事技术、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得到了外部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并非孤军作战。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新闻教研室教师 И. Е. 切尔内绍夫的《1945年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sup>②</sup>一文，以1945年8月至9月苏联塔斯社记者、阿穆尔当地记者、参战者在《阿穆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和报道为依据，展现了苏联红军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中国东北的历史过程。

此外，抗日战争遗产及其对当代东亚政治的影响也日益进入国外学者研究范围。英国剑桥大学现代日本史专家顾若鹏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sup>③</sup>一书，重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司法审判、政策取向及影响。作者认为，在国际层面，中日两国都向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了宣传，从而希望达成自己的目的或者阻止对方达成目的。两个国家也竞相向世界示好：中国的国共双方强调了他们对日本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日本则在战后的民主化改造进程中对盟国百依百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允许对战争罪行审判合法性进行激烈争辩和质疑，这种质疑的声音成为战后日本政治中一股顽固而强硬的势力。对中日战争遗产问题的研究涉及的不仅是历史研究，也是与现实相关的政治研究，值得继续关注。

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选题比较分散。军事斗争方面。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军事史中心研究员和历史学教授谭纳德所著《蒋介石在哪里失去了中国：辽沈战役1948》<sup>④</sup>一书，完整叙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至辽沈战役结束后的历史。在15章的篇幅内，仅用5章直接描写辽沈战役（1948.9.12—1948.11.2），而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抗战胜利后，中共经营东北策略、国民党的东北计划、国共在东北战场角逐的历次战斗以及美国此时的对华政策等。该书重点考察了中共军队为打败蒋介石

从游击战向常规作战转变的历程，认为辽沈战役标志着蒋介石统治大陆失败的开始，也是中共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壮大的开始。该书算得上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全面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的重要著作，吸收了大量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将辽沈战役的发生背景延伸至抗战胜利后，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加以叙述，兼顾美国对华政策和在华行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厚度和视野的广度。

中共政策方面。日本中央大学杜崎群杰的文章《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内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sup>⑤</sup>，以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为中心，对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党内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加以研究，同时也以这个讲话为线索，考察了当时中共党内围绕经济政策的分歧与争论。作者认为，即将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好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但由于中共仍然是一个脆弱的革命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和社会主义政策存在一定的距离，不得不对资产阶级有戒备之心。刘少奇“天津讲话”即是这种戒备之心的象征，因此通过分析这个讲话可以触摸到当时中共经济政策的真实情况。日本上智大学梅村卓的《中国共产党的媒体与宣传：战后满洲·东北地区的历史展开》<sup>⑥</sup>一书中指出，抗

① Б. Н. Горбачёв. Внешняя помощь Китаю в годы войны с Японией (1937 - 1945 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5. №3.

② И. Е. Чернышев. Операции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против Квантунской армии в 1945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газеты «Амурская правд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5. №3, 4.

③ Barak Kushner,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Harold M. Tanner, *Where Chiang Kai-shek Lost China: The Liao-Shen Campaign, 1948*,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⑤ 杜崎群傑 《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内における経済政策の相克 劉少奇の「天津講話」をめぐる》，《中央大学経済研究所年報》2015年第46号。

⑥ 梅村卓 《中国共产党のメディアとプロパガンダ：戦後満洲・東北地域の歴史的展開》，御茶の水書房，2015年。

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接收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新闻机构。他们积极利用这些新闻媒体进行对外宣传、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动员，这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中共党史研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史研究，是国外学者相对重视的研究领域。由于国外研究者不太强调以1978年为时间节点来划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因此一些长时段研究成果比较常见。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学者编撰的论文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若干方面》<sup>①</sup>，收录《苏—俄的中国国史研究》《苏—俄中共党史研究》《关于1949—1960年苏联的对华援助》《1976—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对发展道路的探索》等十余篇综述性文章，集中反映了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共党史的总体研究状况和主要研究成果。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周荣杰和美国格林尼尔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马修·约翰逊合编的《毛主义在基层：中国高度社会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sup>②</sup>一书，收录了中国大陆、欧洲、北美和台湾地区学者13篇论文，以个案研究方式，研究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80年间，中国不同社会阶层、民族和地区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研究他们怎样被认定成分和罪行，如何参与动员、文化与交流以及表达不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历史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社会系教授余伟康在《何谓小资产阶级？“文化置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述中的具体化》<sup>③</sup>一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政权将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具体化为三种叙述类型，即“民族发展的”“政治革命的”和“习惯矫正的”，三者分别代表着历史的、集体的和个人层面上的对小资产阶级的界定。“民族发展的”叙述，通过描绘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

代政治经济历史中的作用和经验，强调他们对国家建设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政治革命的”叙述，从阶级基础角度分析，认为小资产阶级一些先天弱点会形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一种阻碍。“习惯矫正的”叙述，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自我思想改造至关重要，并且就这个层面而言，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自私自利者的思想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与个人身份和出身无关，因此需要通过思想改造，加强个人的修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坚决除去。在实际生活中，这三种叙述主题虽不同，但事实上是交织的，其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要素适用于每一种叙述，但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如善治、个人修养等也是这些叙述的重要来源。作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述极大关系到中国及其人民的发展、革命和政治转变，以及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等。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人转变成为官方阶级定义下的某一类别中的一员。

1954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了宪法草案，开始历时3个月的宪法草案全民讨论。美国狄金森学院教授尼尔·戴蒙德等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全民评议：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运动》<sup>④</sup>，研究了1954年的全民讨论宪法草案的历史。作者认为，1954年中国人卷入了一场大范围的关于政治和社会权力、公民义务、国家标志、宗教信

①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Л. Мамаевой и И. Н. Сотников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КНР: не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 Ин-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М.: Наука - Вост. лит., 2015.

②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Eddy U, What Was the Petty Bourgeoisie? Cultural Positioning and Reification of Marxist Classes in Early PRC Discourse, *Modern China*, Vol. 41 (6), 2015.

④ Neil Diamant and Xiaocai Feng, The PRC's First National Critique: The 1954 Campaign to "Discuss the Draft Constitution", *The China Journal*, Issur 73, January 2015.

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讨论。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政治剧变，一些关于法律、阶级和政治权利等敏感尖锐的问题不断被提起，批评意见也得到公布。这场宪法讨论对于公民而言，构成了第一次国家层面“内部”的对整个中共治理实践的审视和评论，可以看作是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的预演。另一方面，对于官方而言，宪法讨论为国家提供了运用“国家法律”语言应对反抗的机会。因此1954年全民讨论宪法的设定是广泛的，但最终结果是受限的。

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卞历南的《中国革命的再定义：贵州地方国有企业的转变与发展1937—1957》<sup>①</sup>一文，考察了1937年至1957年贵州地方国有企业的产生、发展、转变、破产和被替代过程中，企业组织、管理和运行架构等企业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共从管理上解除了原先掌握权力的职员并且控制了企业的管理权，在企业权力结构层面进行了最彻底的转变，但也继承并扩大了企业自抗战时期就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服务和福利等激励机制。作者就此认为，中国革命对地区经济结构的影响同时兼具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改造。多年来，国外学者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转折和连续性有不同的理解。按照对中国革命的时间状态界定和对1949年前后联接问题看法的不同，这些学者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视中国革命是对过去历史的一个突变，另一派强调中国革命是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统治后一个连续发展的至高点。这篇文章，从个案研究中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就某些地区的某个方面而言，革命的彻底断裂性和渐进延续性是可以并存的。

此外，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龙浩磊的《“去殖民化”在中国，1949—1959》<sup>②</sup>一文，研究了新中国早期从国家层面上所采取的排除外来势力影响的措施，探讨了英美政府和商人对这些措施的反应，以及这些措施对当地民众和在华外国人的影响等。

“大跃进”相关问题研究。美国佐治亚州理

工学院教授卢汉超在《毛主席的口味——“大跃进”期间被作为治国艺术的日常言行及其后果》<sup>③</sup>一文中，选取毛泽东和食物关系中的几个实例，如毛泽东表达对红薯的偏好，在困难时期不吃肉，等等，来分析其言行的原因及客观效果等。当毛泽东“红薯好吃”言论被宣传报道后，扩大红薯种植面积、增加红薯在口粮定量中比例等在现实中一一落实。同时，一些地方为了渡过饥荒，以“红薯借地”的名义，利用毛泽东的指示，灵活地将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户耕种。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权力和声望达到个人崇拜的高潮时，在置饮食于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毛泽东对食物偏好和评论这样的“小事情”却产生出累进效应并被结合进政府决策，成为了治国的艺术。另一方面，基层社会以一种微妙而精明的方式，有效利用毛泽东相关指示，使有利于自身的政治事务具有合法性，事实上这并非是毛泽东倡导和强调政策的本意。这篇文章折射出国外“食物政治学”的研究角度，研究的其实仍是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形成及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方面的问题。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学者法恩瑞认为，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在中国与古巴危机的研究方面忽略了“大跃进”这一重大事件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他在《毛泽东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sup>④</sup>一文中，研究“大跃进”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中苏竞争与古巴1962年危机、中国国际主义的现实政治体现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介绍和梳理了中外学者关于中国

① Morris L. Bian, Redefi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Guizhou's Regional State Enterprises, 1937 - 1957, *Modern China*, Vol. 41 (3) 2015.

② Jonathan J. Howlett, "'Decolonisation' in China, 1949 - 1959", *Britain and China, 1840 - 1970: Empire, Finance and War* Routledge, 2015.

③ Hanchao Lu, The Tastes of Chairman Mao: The Quotidian as Statecraft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Its Aftermath, *Modern China*, Vol. 41 (5) 2015.

④ Enrico Maria Fardella, Mao Zedong and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Cold War History*, Vol. 15, No. 1, 2015.

应对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国内国际背景、过程和最终的效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文章认为,分析毛泽东应对古巴导弹危机,应与其 1962 年上半年发动的针对国外和国内修正主义的斗争相联系,当时毛泽东利用古巴导弹危机在国内发动宣传战,支持古巴革命并且批评苏联修正主义,试图清除来自于党内对“大跃进”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魏昂德发表过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著作。在其新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脱轨的革命》<sup>①</sup>一书中,再次回顾了 1949 年至 1976 年毛泽东领导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全书 14 章,有 6 章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认为 50 年代末以后,中共内部因“大跃进”运动而产生的政策分歧使得毛泽东更为激进,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思想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并且在后来的过程中不断被迫地改变着程序。“文化大革命”重构了国家最高权力,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去造反,在这个过程中,红卫兵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工人和军队都卷入进来。毛泽东始终强烈影响着运动发展的每一回合。作者分析认为,毛泽东经历的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危机,主要是源于对斯大林式意识形态过于简单化的理解。通过历史的回顾,魏昂德解释了为什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需要指出的是,书中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既有一些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也充满了一些过于激烈的判断,对此应加以批判的阅读。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和巴巴拉分校的教授韩起澜等的文章《毛泽东时代上山下乡运动与农村经济发展》<sup>②</sup>,探讨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文章关注知识青年为改变农村现状所做的种种努力,重点揭示边远地区干部如何取得发展农村工业所必需的机械设施和技术培训,

并有效地对知青带来的知识和文化技术等资源加以利用。各地各级“知青办”的建立为城乡沟通创造了条件。通过新的渠道,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紧缺物资——从电线和广播器材到拖拉机和工业机械——从城市运往农村。文章认为上山下乡所涉及的知识青年、知青家长和城乡干部都不是这场运动的决策者,他们对多种资源的发现、开发和利用却超出了这场运动的预期。

对外关系研究。中苏关系方面,日本岩手大学麻田雅文在《围绕返还中长铁路的中苏关系:1949—1952 年》<sup>③</sup>一文,利用俄罗斯近年来公布的原始档案资料,回顾了 1949 年至 1952 年间中苏两国关于归还中长铁路的交涉过程。归还中长铁路,是涉及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 1949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要求苏联归还中长铁路,并于同年底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开始了直接谈判。1950 年 2 月 14 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两国一致同意 1952 年底前苏联归还中长铁路。此外,作者还特别关注了归还中长铁路后,连接中苏两国铁路的接续情况。作者认为,失去中长铁路后,苏联希望铺设贯穿蒙古国一直延伸到北京的铁路,以保持与中国内陆的联系。斯大林以铺设从蒙古国到华北的铁路线为交换条件,最终同意归还中长铁路。此外美国长岛大学夏亚峰与中国学者沈志华合著的《毛泽东与中苏同盟:1945—1959》<sup>④</sup>一书,也得到国外学术界好评。

中国和欧洲国家关系方面。英国学者马丁·阿尔伯斯在《条条道路通北京? 西欧与东亚的

① Andrew G.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Emily Honig and Xiaojian Zhao, 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2, June 2015.

③ 麻田雅文 《中国长春鉄道の返還をめぐる中ソ関係、1949—1952 年》,《アジア研究》61 (1), 2015 年 1 月。

④ Zhihua Shen and Yafeng Xia, *Mao and the Sion-Soviet Partnership, 1945 - 1959 A New History*, Lexington Books, 2015.

缓和, 1969—1972》<sup>①</sup> 一文中回顾了冷战时期西欧三个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与中国恢复关系的历程, 比较了这三个国家与中国恢复关系时各自的特点, 以及中国与其交往中的不同应对。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 该文认为长期以来, 这一时期西欧国家与中国恢复交往的事实因同时期中美关系缓和被过度强调而受到忽略, 要真正理解这些进程就不能只注意大国关系, 应该从更宏大的视角, 看到相关的小事件、枝节事件对于国际化事件的直接影响作用。同样,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中英关系专家 Chi-Kwan Mark 的《等待尘埃落定: 中英关系正常化与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之旅 1971—1972》<sup>②</sup> 一文, 也考察了中英关系正常化与中美关系恢复之间的复杂的交织影响关系。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破冰与欧洲开启和缓化进程被独立地看作冷战时的两个事件, 以往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初西欧国家对华关系, 通常关注的是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特殊方面, 而比较少将其置于全球冷战背景下欧洲和缓化进程的背景中。上述相关研究从全球角度, 对历史事件间的交叉影响和相互作用进行综合分析, 这种大视角值得肯定和借鉴。

中国对外援助方面。日本学者山岸健太郎的《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sup>③</sup>, 介绍了 1950 年中国开始援助朝鲜至 1979 年中美建交期间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演变, 并以中国重返联合国为例, 分析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其国际关系的影响。文章将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0—1963 年), 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越南、蒙古、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及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亚非国家开展援助; 第二阶段 (1964—1970 年), 主要是扩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 第三阶段 (1971—1978 年), 中国同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国建交。文章认为,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超出了当时的国力水平, 但其对改善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

##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 也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中共的执政能力、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建设、社会管理及问题应对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都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共执政能力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研究是国外学者持续关注的课题, 每年都会有相应研究成果出现。英国德蒙福特大学讲师曾敬涵所著《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 思想、合法性与党的凝聚力》<sup>④</sup> 一书, 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略。作者考察了中共对人民认可的追求, 分析了中共的凝聚力问题, 认为思想改造和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是党保持权力的重要因素。作者还提出, 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对中共传统准则的挑战, 中共正通过不断的努力来自我调整适应新的形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长滩分校政治学教授特蕾萨·莱特所著《后毛时代中国的党与国》<sup>⑤</sup>, 详细分析了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共在现实国家治理中, 已经实现了稳定的治理政权的必要功能: 令关键群体满意; 回应公众的不满情绪; 坚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释放公共服务等。并且在实现这些功能中,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和影响没有任何的减少。作者

① Martin Albers, All Paths Leading to Beijing? Western Europe and Détente in East Asia, 1969 - 1972,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2, 2015.

② Chi-Kwan Mark, Waiting for the Dust to Settle: Anglo-Chinese Normalization and Nixon's Historic Trip to China, 1971 - 1972,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9, No. 5, Nov. 2015.

③ 山岸健太郎 《中国による对外援助と国際関係: 1950年代から文化大革命終結まで》, 《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2015年, 第319—340页。

④ Zeng Jingh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pacity to Rule: Ideology, Legitimacy and Party Cohe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⑤ Teresa Wright, *Party and State in Post-Mao China*, Polity, 2015.



指出中共持续成功的关键在于认真地维护了一些重要的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特性,虽然与此同时其正在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积极回应公众的参与。因此可以将改革时代的中国这种党政国家看作包括自由民主治理在内的不同政治统治形态的组合。加拿大政治学教授贝淡宁在《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sup>①</sup>一书中,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概括为“垂直的民主精英制度”,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帮助民主选举制度克服其关键性的不足。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教授在《理解中国:丝绸之路与共产党宣言》<sup>②</sup>一文中认为:尽管今天的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仍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共产党面临着两个关键问题,即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大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中共的干部培训是近年西方学界研究中共执政能力时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李咏平的著作《党的培训:中国改革时期党的调适与精英培训》<sup>③</sup>,通过史料和田野调查以及访谈等多种形式,全面考察了中共党校体制的历史、组织体系和学校教学安排、运作方式及其在中国高级党政精英培养过程中发挥的特殊且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中共已经经受住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考验,在当前的改革中通过坚持集中制继续生存,在这一过程中,党校体制为中共培训政治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世纪以来,由于党对干部培训工作的重视和各类党的干部培训机构的快速发展,通过研究党校和党员培训进而探究中共执政秘密已成为一个研究亮点,相关成果不在少数。比起以往的研究成果,该书的特点在于:一是将以往西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吸收和总结,二是作者在研究中吸收了不少调查成果。当然,这种局部调研的研究方式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和发展趋势始终是国外学

者分析研究的重点。2015年3月16日,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的中国”学术研讨会。远东所副所长、该中心主任A. B.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报告中提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和扩大居民就业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存在经济风险。就外部来说,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需求增长艰难。中国国内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劳动力人口减少;二是能源不足;三是环境污染。要化解以上风险,中国首先要加速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新的加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sup>④</sup>

对于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放缓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政策,国外学者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O. H. 博罗赫在《中国特色的“新常态”》<sup>⑤</sup>一文中,探讨了“新常态”概念的理论来源、形成过程及其区别于西方对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描述。作者认为,中国的“新常态”指的是经济增长转向另一阶段的客观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新常态”带有更多积极的要素。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健康且富有活力。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将有利于经济质量的提升。《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国内变革》<sup>⑥</sup>一书集合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认为“新常态”这个短语抓住了中国经济正在增长的模式和驱动力上发生变化的特点。中国的

①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Peter Nolan, *Understanding China: The Silk Road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outledge, 2015.

③ Charlotte P. Lee, *Training the Party: Party Adaptation and Elite Training in Reform-Era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Центр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итая ИДВ РАН «Китай на новом этап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5. №3.

⑤ O. H. Borokh. «Новая нормальность»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5. №3.

⑥ Ligang Song, Ross Garnaut, *China's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ANU Press, 2015.

增长率在放缓，结构转变也不易。新经济状态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其经济合作伙伴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是国际政界和商界持续关注重点。美国经济学教授邹至庄是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之一，他的《中国的经济转型》<sup>①</sup>自2007年第一版到2015年修订的第三版，已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必读之物。在2015年的新版中，作者试图回答海外受众最关心的以下问题：中国是否能够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这种增速还能持续多久，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会遇到哪些障碍，谁将获利最多，等等。作者在第五章用了中国GDP、劳动力与资本从1952年到2013年的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本与GDP的关系，认为到2013年为止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减慢。

也有学者从历史角度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孔诤烽的《中国繁荣：为什么中国将不会统治世界》<sup>②</sup>一书，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繁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背景结合在一起，综合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细节来说明中国发展与全球经济的关系。作者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毛泽东在农业经济背景下通过强制工业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其继任者忍受农村腹地的相对停滞，培育依赖沿海城市出口经济和推进大型国有企业发展。这一战略迅速推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引起治理方面的新问题，如过度依赖出口；在公共基础设施上的过度投资；债务危机等。身处仍然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里，中国还不会超越美国统治世界。

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利用研究。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15年11月号推出主题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崛起：中国秩序、大同和天下”专栏，相关论文研究了中共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利用。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柯岚安的《历史、传统与中国梦：世界大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sup>③</sup>一文，研究了毛泽东1956年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和《礼记》中的《大同》这两篇文章。在作者看来，研究这两篇文章，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怎样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把自身变成一种传统理念。作者认为这种转变不是从共产主义到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结合。这种理念在一个新的国家主义体系下整合了公平愿望和等级制度，又被裹挟进全球竞争的社会模式中。这两篇文章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共同的追求，但有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西方和美国。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在《“天下说”：中国将改变国际体系？》<sup>④</sup>一文中，比较了儒家传统的“天下说”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认为对在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受到包围并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天下说”作为一种组织原则是一种先进的说法。历史上中国政府积极参加联合国、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并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可能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原则性地位，但坚定地保卫着自己主权的中国在坚持这一思想的同时，也注重努力宣传儒家大同世界的优点。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调查顾问福特在《党与圣贤：共产主义中国利用准儒学合理化为党的执政和国家雄心服务》<sup>⑤</sup>一文中认为，类似儒家的政治思潮和著作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背

① Gregory C. C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3rd Edition*, Wiley-Blackwell, 2015.

② Ho-Fung Hung,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William A. Callahan, "History, Tradition and the China Dream: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Great Har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6, November 2015.

④ June Teufel Dreyer, "The 'Tianxia Trope': Will China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6, November 2015.

⑤ Christopher A. Ford, "The Party and the Sage: Communist China's Use of Quasi-Confucian Rationalizations for One-party Dictatorship and Imperial Ambi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6, November 2015.

景下受到中共的鼓励并且用来对抗民主多元化的西方思想,使中共在中国的执政合理化。文章指出这种思想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共提出要吸收发扬传统中的优秀儒学思想,此后,这种学说在中国国内政治中的作用持续增长,并不断出现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

中外关系研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B. Я. 波尔涅科夫的专著《21世纪中国对外政策》<sup>①</sup>,分析了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和特点,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了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领导集体对外政策的影响。作者还研究了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国际舞台政治的作为,评价了中国未来复兴的前景和可能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改变。

俄罗斯已故科学院院士、原远东研究所所长M. Л. 季塔连科生前同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A. B. 洛马诺夫合作完成的《中国大国战略的政治文化视角》<sup>②</sup>一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在外交领域提出的一些新思想。认为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得以让中国在同外部世界交往中结束单纯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是转向寻求经济利益与政治、外交目的的协同实现。例如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的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义利观”思想。这种具有恒久价值基础的思想理念,有助于中国将以往的国际经济合作政策转变成一个有影响的世界大国的行为准则,这也将在中国同睦邻国家践行“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得以体现。

美国空军战争学院教授张晓明在《邓小平的漫长战争:中越间的军事冲突1979—1991》<sup>③</sup>一书中指出,1979年仅有月余的中越战争比学者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更有深意、更为重要。作者认为,1979年的中越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持续到1991年——超过十年的低级别军事冲突的序曲。整个长时段的战争削弱了越南控制缅甸和泰国的能力,牢固地奠定了冷战时期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切断了莫斯科控制东南亚的机会。此外,这场战争对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

建设战略设计也有特别意义。正是在对越作战中中国军队暴露出的后勤保障、指挥方面的弱点,使得邓小平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军事现代化放在第二位,并进一步明确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从传统地面作战转向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作者指出,中越之间的战争冲突是日后时温和时冷淡的中越关系里,越南长期存在对中国不信任的根本原因。

英国伦敦国王大学防卫研究系讲师雨果·梅耶的《平衡安全利益冲突:冷战最后十年的美国对中国军事出口》<sup>④</sup>一文,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武器和军事技术出口的问题。作者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是非常严厉的,到80年代才逐渐宽松。80年代时,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出口政策有阻止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但实际上对华军事出口的规模和种类根本上是受制于美国东亚的安全利益,包括阻止中国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盟友的威胁,约束中国核武器扩散,警惕中国与巴基斯坦、朝鲜的关系。1985年3月,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美国更担心对华军售给美苏关系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受国家利益影响,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十年,美国的对华军事出口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当然,即使受到限制,这一时期的美中军事供应合作达到50年代以来无法想象的水平。这种合作方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

① B. Я. Портыко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XXI столетии: монография — М.: ИДВ РАН, 2015.

② M. Л. Титаренко, A. В. Лома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 стратег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итая как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5. №3.

③ 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 - 1991*,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④ Hugo Meijer, *Balancing Conflicting Security Interests: U. S. Defense Exports to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7, No. 1, Winter 2015.

## 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2015 年中共领袖和重要人物思想与生平研究也有一些成果。除前面在党史分期介绍中提到过的一些论著, 还有以下内容值得关注。

毛泽东研究。由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生前参与编辑的《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 革命文献 (1921—1949)》第八卷<sup>①</sup>于 2015 年出版。《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 革命文献 (1921—1949)》又称《毛泽东集》, 由斯图尔特·施拉姆主持编纂, 许多西方学者参与编辑和翻译, 收录毛泽东 1949 年前的著述, 自 1992 年起陆续出版, 计划出版 10 卷。2012 年施拉姆去世时该文集已出版至第七卷。第八卷由施拉姆和齐慕实主编, 南希·霍兹任副主编。该卷收录毛泽东 1942 年 1 月至 1945 年 7 月文稿、讲话、电报、书信等各种形式的文献 230 多篇。它的出版为西方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资料。

日本学者土田秀明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抗日论之考察》<sup>②</sup>一文中考察了苏维埃时期毛泽东的抗日思想。作者认为,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产生了抗日的意识。蒋介石主张在“安内”的同时, 通过和日本的妥协或外交极力避免“攘外”。而毛泽东主张对国民党的反“围剿”斗争与抗击日本密不可分。抗日战争并不完全只是和日本军队的战争, 抗日当然也是内部战争、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抗日”意识。

邓小平研究。由美国俄亥俄州首都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和美国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研究员梁思文合著的《邓小平: 革命人生》<sup>③</sup>是一本完整记录邓小平一生的传记图书。该书记述了邓小平从童年到 1997 年去世的历史。全书正文分“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三部分, 共 24 章, 剖析邓小平波澜起伏的一生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评价他的功过。作者利用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秘密档案, 包含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先前大量

未解密的邓小平相关资料以及 3300 名中共领导人的文献数据库, 同时访谈许多曾与邓小平共事、往来及受其影响的人物。资料涉及中文、俄文、英文与法文资料。由于该传记并非仅仅聚焦于邓小平晚年执政时期, 其较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来说, 史料更为完整全面。该书出版后, 引发较高关注。

习近平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 有关习近平的图书不断推出<sup>④</sup>。2015 年 5 月,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 Ю. В. 塔夫罗夫斯基撰写的《习近平: 正圆中国梦》<sup>⑤</sup>在莫斯科出版。该书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条主线, 介绍了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及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和过程, 高度评价了习近平为实现中国梦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5 年 8 月, 由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介主编的《习近平时代》<sup>⑥</sup>在美国纽约出版。全书以宏大篇幅, 全面介绍了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和他提出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① Stuart Schram, Timothy Cheek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Volume VIII*, Routledge, 2015.

② 土田秀明: 《ソヴェト期における毛沢東の抗日論に関する一考察》, 《佛教大学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篇》(43), 2015 年 3 月。

③ 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2015 年出版的英文相关图书有《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 复兴, 革新或者退回老路》(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Renaissance, Reform, or Regression*, Routledge, 2015), 《习近平: 红色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Agnès Andréys, *Xi Jinping: Red China, the Next Generation*, UPA, 2015), 《习近平时代: 通向中国梦的大战略》(James C. Hsiung, *The Xi Jinping Era: His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ward the China Dream*, CN Times Books Inc., 2015),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 集体领导再评估》(Li Cheng,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5), 等等。

⑤ Ю. В. Тавровский. Си Цзиньпин: По ступеням китайской мечты. М: Эксмо, 2015.

⑥ James C. Hsiung, *The Xi Jinping Era: His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ward the China Dream*, CN Times Books Inc., 2015

略，并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作出了正面回应。该书英文版登上美国亚马逊中国历史类第一名、全球政治领袖类第二名、亚洲政治类第三名，销量10万多册。

回顾2015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国际化学术趋势初现。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开始与国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产生更多的重叠与交织，学者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投入更多的关注，以往以西方或者美国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有所突破，选题更加丰富。但也应看到，西方学者转换研究视角不仅需要国际学术潮流的推动，还需要研究基础条件方面的推动。例如，学者在研究中对不同国别文献资料使用并不平衡，不少英文著作更偏向参考英文资料，甚至是日文资料，而没有利用中文资料。第二，国外学者更为重视对中国学者观点的借鉴，甚至将对中国学者观点考察结果做为观察中国的结论。如美国学者在辽沈战役的研究中，对战争阶段划分、战争意义都认同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再如德国汉堡GIGA亚洲研究协会倪宁灵的《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国际理论的再考察》<sup>①</sup>一文，通过考察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政治理论成果，分析了中国学术界对“有中国特色”国际理论的最新论述并揭示了其历史和哲学的根源。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丹尼尔·林奇的《中国的未来：中国精英探讨经济学、政治学和外交政策》<sup>②</sup>一书，通过调查中国精英人物在主要关乎中国发展的“经济”“国内政治程序和制度”“通讯和互联网”“外交政策战略”“国际软实力”五

个问题领域的争论情况，看中国的领导者及其精英们是怎样估计他们自己国家的未来。第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国外中国学的发展。2015年底，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海外中国学已经渐成主流<sup>③</sup>。2015年11月刚刚接任美国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宋怡明也表示，现在美国学者在界定一个理论是否能被称为“大理论”时，一定要看看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不然该理论就不能称为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中国是发展新理论的“热土”。<sup>④</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继续关注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国外中国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

本文旨在介绍相关图书和文章基本信息和利用线索。相关论著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以及其中可能会包含的一些片面、错误甚至荒谬的观点和内容，并不代表介绍者的立场和看法，敬请读者在阅读原文时辨别研判。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张 政)

- ① Nele Noesselt, Revisiting the Debate On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2, June 2015.
- ② Daniel Lynch, *China's Futures: PRC Elites Debat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③ 冯黛梅 《海外中国研究的“精彩”时刻——访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31日。
- ④ 冯黛梅 《中国是发展新理论的“热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7日。